

政府信任、企业信任与污染类邻避行为意向影响机制 ——基于江苏、山东两省四所化工厂的实证研究

秦梦真 陶鹏¹

(南京大学, 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 信任影响着邻避设施的风险感知结果、风险态度和行为意向, 是风险沟通管理的润滑剂。以污染类邻避冲突为研究语境, 以因果链为逻辑基础, 基于增长机器理论将信任细分为政府信任和企业信任, 分析信任如何通过作用于风险感知进一步影响邻避冲突行为意向, 可以发现: 政府信任对利益感知与公民接受型行为意向有显著正向影响; 企业信任对风险感知有显著负向影响, 对利益感知有显著正向影响, 企业信任在利益感知对行为意向的作用机理中发挥着正向调节作用。此类冲突的化解可有三条路径: 一是政府加强安全监管, 巩固政府信任; 二是企业应该承担起相应社会责任, 重塑企业信任; 三是居民应当打开沟通渠道, 承认并弥合差异。

【关键词】: 政府信任 企业信任 风险感知 行为意向 作用机理

【中图分类号】: D6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6924(2020)10-0061-09

一、引言

在现代社会向“后现代”转型的过程中, 与人的思维、情感、价值观紧密相连的社会风险不断增加。与客观存在的危险和灾难不同, 社会风险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众的认知^[1], 同时受到风险情景中信任等心理要素的影响^[2]。公众出于自我保护和降低风险认知成本的需要, 在风险评估中对公共信任体系的依赖程度不断增加, 以政府为主的风险掩饰行为会受到公众的强烈关注, 风险管理的复杂性不断提升^[3]。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和城市化发展进程的推进, 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无序性、难预测性不断增加, 越来越多的社会风险演变成社会冲突, 污染类邻避冲突便是其中的典型之一。从厦门PX事件、漳州PX事件到连云港反核废料事件, 邻避冲突成为我国最激烈、最被人关注的集体行动^[4]。在邻避现象中, 以普通公众为主体的社群联盟在面对设施的风险时, 高度未知性风险和扩散性恐慌大大削弱了其理性选择、认知信息的能力, 产生所谓的“社会放大效应”^[5]。与此同时, 政府对经济发展的盲目追逐使其逐渐偏离公共性理念, 政府与主张兴建邻避设施的企业组成增长联盟, 联盟间的博弈特性不断显现^[6]。邻避决策中的单独决策、违反程序、相关信息不公开甚至隐瞒等行为引发了由普通民众组成的社群联盟不满, 也使政府深陷“塔西陀陷阱”。信任的缺失降低了邻避情境中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风险沟通效率, 使得社群联盟接受风险评估结果和改变其风险行为意向的难度加大, 邻避现象不断陷入的“抗争—妥协”的怪圈^[7]。

鉴于此, 风险管理研究者愈发认识到信任对与风险沟通和风险政策的高效执行的重要作用。当前, 已有相关研究基于心理测量范式探究了影响风险感知的多种因素, 并以信任为研究对象探究其公众的风险感知结果、态度和行为的作用机理, 但对某一具体情境中信任与风险关系关注仍旧不足^[8]。首先, 在污染类邻避冲突这一联盟特性愈加明显的现实情境中^[9], 公民的信任对

¹作者简介: 秦梦真,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应急管理。

陶鹏, 南京大学管理学博士, 清华大学管理学博士后,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南京大学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 应急管理。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简政放权背景下社会风险的体制性扭曲及治理研究”(19CGL001)。

象不仅是政府还有邻避设施私人运营商——企业。其次，在对信任与风险感知的考察中，多从综合角度强调宏观风险感知对邻避冲突的影响，对“利益感知”关注有限。最后，“信任”这一议题在西方语境中已进行开较为丰富的研究，但在有关政府信任的研究在我国特定的语境中缺乏一定的普适性。

在风险社会，风险管理研究者的最终使命就是回答政治权威和科技权威如何在风险社会中得以维系的问题^[10]。本研究汲取风险社会理论的核心——对现代性的反思，探究在污染类邻避冲突的研究语境中，公众对于增长联盟的信任是如何作用于风险感知进而影响公众对于邻避设施的接受型行为意向。对此，本研究基于因果研究链，构建公众信任—公众风险感知—接受型邻避行为意向的演绎路径，基于增长机器理论将信任二分为政府信任和企业信任，将广义风险感知二分为狭义风险感知和利益感知，通过实地调研剖析信任、风险感知和接受型邻避行为意向的作用机理，以期政府重塑社会信任、制定良性风险管理战略和化解邻避冲突提供路径参考。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邻避情境中的信任、感知与行为意向

信任是风险行为有关研究中一个重要变量，作为衡量期望和实际上产出是否一致的心理状态^[11]。Deustch 最早将信任与与风险相联系，认为风险的不确定性与风险结果紧密联系，影响着风险态度和行为意向^[12]。之后，Luhmann 将信任研究上升为超越心理范畴的简化社会交往的机制，信任不仅是一种单纯的心理评估，还是解决问题的方式^[13]。在对邻避问题的研究中，自 1996 年 Slovic 对核问题、男性白人效应以及风险信任问题进行研究后，信任逐渐成为邻避情境的重要研究因素^[14]。

感知对行为意向影响的研究更为成熟。从“风险—利益”感知视角出发，利益感知通常指公众对某项技术或者活动所能带来的利益的主观感受，风险感知相反。在这一过程中，风险沟通是关于环境和健康风险的信息在各利益组织之间有目的地交换，因此风险沟通不仅要报告风险信息，也要报告利益信息，人们只有获得利益才能愿意冒着风险去从事某些活动^[15]。但当前研究多为讨论风险感知对行为意向的影响诸多实证研究发现其对公众态度产生直接的负向影响^{[15][16][17]}，但从利益维度考量邻避类公共政策问题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18][19][20]}。

与此同时，信任、风险感知和行为意向三者的关系也被诸多逻辑推理与实证研究探讨。Luhmann 提出信任通过降低个体对风险情境中可能结果的负面认识增加来交易行为^[21]。Mayer, Davis 和 Schoorman 将风险区分为主观认知和实际行为两个层面，信任与风险行为之间的关系受到风险认知的调节^[22]。Das 和 Teng 基于“人格特质—主观认知—实际行为”的逻辑递进关系提出信任与风险感知负相关，主观感知影响实际行为。已有实证研究在心理测量理论的基础上也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证实：Warhurst 发现信任在采矿业获得与维持社会经营许可证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风险感知、利益感知分别通过信任的调节效应预测个体的邻避行为意向^[23]；李小敏和胡象明在信任与风险关系的中介作用模型中指出：信任是通过影响风险感知对实际的风险承担行为产生影响，主观信任与风险感知、风险感知与风险承担行为之间都呈负相关关系^[24]。

综上，一方面当前研究对狭义利益感知对行为意向的影响关注较少；另一方面，对于信任、感知和行为意向的相互作用机理研究不深入，尤其是在信任 and 感知之间的关系上，难以全面揭示邻避效应中利益相关者态度与行为之间的形成机制。因此本研究将狭义风险感知、利益感知与信任纳入邻避行为意向影响因素的研究范围，基于居民邻避冲突行为意向是风险感知、利益感知与信任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的前提，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 风险感知、利益感知和信任预测个体的邻避行为意向。

H2: 风险感知与接受型邻避行为意向呈正相关，利益感知与之呈负相关。

H3:信任与风险感知呈负相关,与利益感知呈正相关,与接受型邻避行为意向呈正相关。

H4:风险感知、利益感知分别通过信任的调节效应预测个体的接受型邻避行为意向。

(二)邻避情境中的政府信任、企业信任、感知与行为意向

在公共管理领域,近些年学者对政府信任的关注度不断提升。在邻避情境中政府信任通常被定义为:公众基于对政府部门采取的特定代表其利益行为的积极期待,及选择接受将其脆弱特质暴露在潜在邻避风险下的主观意愿^[1]。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水平及其对邻避设施的积极态度正相关^{[4][25][26]};信任与风险承担行为之间都呈负相关^[27]。但在部分研究中,未厘清公共部门的政府和私人部门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信任研究既包括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还包括公众对邻避设施私人运营商的信任,使得邻避情况中信任研究精细测量程度不足。

与此同时,在中国现实情境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政工作以“将蛋糕做大”为目的,政商联盟成为一种新的战略^[28]。在社会双向运动中^[29],利益主体之间的双重联盟及博弈行也成为常态,民众在邻避情景中的信任对象逐渐转变为政府和企业联合的增长联盟。具体表现为以政府和企业为代表的增长联盟借助手中的资源、组织能力和话语权构建增长导向的政策网络推进邻避设施的落地,在此背景下由利益受损者联合起来的社群联盟组织集体行动来表达诉求、进行自我保护。^[30]在邻避冲突前夕的风险沟通中,公众都期待被信任者能够传达真实、可靠、完整的信息,包括风险信息与利益信息,当公众认为被信任方的行为符合期望时,便会相信政府和相关企业会对风险进行有效控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接纳政府与相关企业的行为。综上所述,本研究在探究信任、感知与邻避行为意向作用机理的同时,重点探究居民信任水平对风险感知的影响,将信任划分为政府信任和企业信任,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5:政府信任与接受型邻避行为意向呈正相关,且在利益感知对接受型行为意向中发挥的正向调节作用。

H6:企业信任与接受型邻避行为意向呈正相关,且在利益感知对接受型行为意向中发挥的正向调节作用。

三、数据来源和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通过测量聊城市L化工厂与X铝厂、连云港市H石化厂与B炼钢厂周边居民对邻避设施的风险感知、利益感知、信任与接受型行为意向水平,研究邻避冲突行为意向的影响机理。其中侧重信任(政府、企业)对风险感知与行为意向的影响。假设构建围绕信任在风险感知与利益感知对接受型行为意向之间的作用机制,以及风险感知、利益感知分别与行为意向之间的关系而展开。以上假设的验证可有助于探究邻避冲突的形成机制,为政府构建邻避设施管理体系、对周边居民进行宣传和引导提供理论与现实依据。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参考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Commonwealth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Research Organizations, CSIRO)所制定的关于中国民众对待采矿业态度的调查问卷^[2]。在进行本土化处理后,该问卷整体的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79,KMO系数为0.85,说明问卷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良好^[3]。

本研究抽取山东省聊城市L化工厂、X铝电厂与江苏省连云港市H石化厂、B炼钢厂周边居民展开问卷调查。于聊城市选取6村1街道,于连云港市选取5村,于2017年1至2月进行问卷发放与收集。为兼顾抽样的科学性与便利性,采用随机抽样方法中的等距抽样法与分层抽样法,即依据随机数表生成的随机数从某村门牌花名册上找到一户作为随机起点,以5户为组距实施等距抽样,依据居民年龄实施分层抽样。结合村中青壮年人多外出务工、早出晚归的特点,本项目在白天入户调查中主要针

对中老年人(45 岁以上)人群进行抽样,夜晚则主要针对青壮年人(45 岁以下)人群进行抽样。同时,为了避免家庭成员间的互相干扰,本项目在夜晚的抽样调查中剔除了白天接受过调查的家庭。

(二)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1. 变量说明

问卷主要测量以下四个方面:利益感知、风险感知、信任与邻避行为意向。利益感知、风险感知、信任为自变量,接受型行为意向为因变量。利益感知方面分为四个维度:经济利益、教育、基础设施和就业。风险感知方面分为五个维度:财产与经济效益、安全风险、环境影响、健康影响、整体的污染感知。信任方面分为政府信任与企业信任两个维度。接受型邻避行为意向方面通过询问被试“如果造成污染,为了改善环境,您在多大程度上认可平静接受行为?”来测量被试的行为意向。

本研究采用李克特五点计分法测量居民的利益感知、风险感知、对政府和企业的信任度与行为意向。在健康影响维度与整体污染感知维度的部分项目(例如“您认为自身受到工厂污染的危害大吗”)中,1=没有危害,2=比较没危害,3=危害一般,4=比较有危害,5=危害很大;除此之外的其他项目均设定:1=完全不同意,2=比较不同意,3=中立,4=比较同意,5=完全同意。每个维度所包含项目的得分均值为该维度得分,得分越高,表明被试在该方面越赞同。

2. 描述性统计

问卷调查结束后,共回收 524 份问卷,剔除无效问卷后得有效问卷 461 份。在 461 份有效问卷中,男性 229 人,占 49.67%;女性 232 人,占 50.33%。化工厂 L 周边居民问卷 160 份,占 34.71%;铝电厂 X 周边居民问卷 191 份,占 41.43%;石化厂 X 与炼钢厂 B 周边居民问卷共计 110 份,占问卷总数的 23.86%。

(1)人口学变量统计

其余人口统计学变量包括年龄、受教育程度与家庭年收入,共统计结果见表 1。

表 1 被试人口学变量统计结果(N=461)

项目	人口学变量	人数(单位:人)	百分比(%)
性别	男	229	49.67
	女	232	50.33
	合计	461	100.00
年龄	20 岁以下	20	5.15
	20 至 29 岁	173	37.73
	30 至 39 岁	102	22.06
	40 至 49 岁	81	17.31
	50 至 59 岁	52	10.72
	60 至 69 岁	15	3.09
	70 岁及其以上	18	3.92
	合计	461	100.00
学历	小学或以下	34	7.38
	初中	76	16.49

	高中	80	17.35
	大专	109	23.64
	本科	160	34.71
	硕士及以上	2	0.43
	合计	461	100.0
家庭年收入	3 万及以下	133	28.85
	3 万元至 6 万元	165	35.79
	6 万元至 10 万元	93	20.17
	10 万元至 20 万元	47	10.20
	20 万元及其以上	23	5.00
	合计	461	100.00

(2) 自变量

自变量的总体情况可从表 2 的初步描述统计结果看出。总体而言，两市邻避设施周边居民的风险感知比利益感知偏高。风险感知总水平处于比较同意 ($M=3.809735$)，且分布较为集中 ($SD=0.7706167$)；利益感知总水平接近中立态度 ($M=3.204089$)，且分布相对分散 ($SD=0.9598431$)。

与企业信任相比，居民对政府的信任水平比较高 ($M=3.024871$)，且认知更加统一 ($SD=0.9957707$)，而对企业的信任水平略低 ($M=2.851042$)，且认知上存在更大的分歧 ($SD=1.021811$)。

表 2 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自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利益感知	3.204089	0.9598431
风险感知	3.809735	0.7706167
政府信任	3.024871	0.9957707
企业信任	2.851042	1.021811

(3) 因变量

根据统计结果，当污染事件发生时，两市邻避设施周边居民对“平静接受行为”的认同程度不高，总体意向于“比较不同意” ($M=2.237473$, $SD=1.245091$)，即大部分居民不会平静接受污染事实。

四、实证结果

(一) 风险感知、利益感知、信任与接受型邻避行为意向的相关分析

第一步，通过一般线性回归分析，总结两市邻避设施周边居民总体各变量的相关性情况。首先，企业信任与政府信任之间的相关值最高，呈显著的正相关 ($r=0.76$, $p<0.05$)，即居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越高，对企业的信任程度也越高；从利益感知来看，

利益感知与政府信任($r=0.53, p<0.05$)、企业信任($r=0.57, p<0.05$)分别呈显著的正相关;从风险感知来看,风险感知总水平与政府信任($r=-0.30, p<0.05$)、企业信任($r=-0.34, p<0.05$)、利益感知($r=-0.37, p<0.05$)均呈显著的负相关,但相关值不高;接受型行为意向与政府信任($r=0.28, p<0.05$)、企业信任($r=0.23, p<0.05$)、利益感知($r=0.23, p<0.05$)呈显著的正相关,与风险感知($r=-0.23, p<0.05$)呈显著的负相关,但相关值均不高。

表 3 居民风险感知、利益感知、信任与接受行为意向之间的相关关系

变量	性别	年龄	学历	收入	居住区	政府信任	企业信任	利益感知	风险感知	接受行为意向
性别	1.00	-0.00	0.02	0.02	-0.14	0.08	0.08	0.09	0.07	-0.03
年龄		1.00	-0.26*	-0.13	-0.23*	0.06	0.03	0.06	-0.06	0.13
学历			1.00	0.37*	0.41*	0.06	0.07	0.11	-0.03	-0.08
收入				1.00	0.37*	0.01	0.01	0.08	0.01	0.09
居住区					1.00	-0.18*	-0.09	-0.05	0.00	-0.02
政府信任						1.00	0.76*	0.53*	-0.30*	0.28*
企业信任							1.00	0.57*	-0.34*	0.23*
利益感知								1.00	-0.37*	0.23*

注:***表示在 1%的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 5%的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 1%的水平上显著。

(二)政府信任、企业信任的调节效应检验^[31]

之后,为考察两地邻避设施周边居民的政府信任、企业信任在风险感知、利益感知与接受型行为意向关系间的调节效应,采用层次回归分析的方法,探讨在何种情况下感知可以预测接受型行为意向。为了避免数据可能存在的共线性问题,分析前对自变量(感知)和调节变量(信任)进行中心化处理。在信任的调节效应检验中,首先将人口统计学变量(性别、年龄、学历、收入)作为控制变量放入回归方程,第二步放入回归方程的是自变量和调节变量,即风险感知、利益感知与政府信任、企业信任,第三步放入回归方程的是自变量与调节变量的交互项,即风险感知-政府信任、风险感知-企业信任、利益感知-政府信任、利益感知-企业信任。

从表中可知,年龄对邻避冲突行为意向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t=2.11, sig=0.035$),即随着年龄的增长,居民对邻避设施的接受意愿越强;同理,学历对接受型邻避行为意向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t=-3.13, sig=0.002$),而收入对接受型行为意向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t=2.65, sig=0.008$)。居民对政府的信任水平对接受型行为意向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t=3.11, sig=0.002$),而风险感知对接受型行为意向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t=-2.87, sig=0.004$)。企业信任与利益感知对接受型行为意向的预测作用均不明显。

政府信任对接受型行为意向有正向预测作用($t=1.27, sig=0.204$),但结果不显著;企业信任对接受型行为意向有较为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t=-1.86, sig=0.064$);利益感知对接受型行为意向有负向预测作用,但结果不显著($t=-1.15, sig=0.251$);而风险感知对接受型行为意向的仍然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t=-1.83, sig=0.067$)。

企业信任-利益感知交互变量对居民接受型行为意向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t=1.98, sig=0.048$),故本研究认为,企业信任在利益感知对接受型行为意向的作用机理中发挥了明显的正向调节作用。而政府信任的调节效应尚不明显。

(三)风险感知、利益感知的中介效应检验

最后，采用路径分析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根据温忠麟、侯杰泰等人的研究，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的前提是预测变量、中介变量和因变量三者是显著相关的^[32]。由各变量相关分析可以看出，政府信任分别与风险感知、利益感知显著相关，企业信任分别与风险感知、利益感知显著相关，同时，政府信任、企业信任与居民的“平静接受行为”也呈现显著相关，满足中介效应检验的前提条件。因此，下一步本研究采用路径分析，将感知作为中介变量，继续探讨风险感知、利益感知分别在政府信任与行为意向之间、企业信任与行为意向之间的中介效应。

为验证风险感知、利益感知的中介效应，对两地邻避设施周边居民的风险感知、利益感知、政府信任、企业信任与接受型行为意向五者之间关系进行建模，进行结构方程模型检验，结果如图 3 所示。回归系数结果显示，政府信任对利益感知有显著正向影响 ($\beta = 0.223, sig = 0.000$)，即居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越高，其利益感知越高；企业信任对风险感知有显著负向影响 ($\beta = -0.266, sig = 0.000$)，对利益感知有显著正向影响 ($\beta = 0.405, sig = 0.000$)。居民风险感知对接受型行为意向有显著负向影响 ($\beta = -0.146, sig = 0.003$)；政府信任对接受型行为意向有显著正向影响 ($\beta = 0.205, sig = 0.003$)。

由此可知，风险感知在企业信任与接受型邻避行为意向之间扮演中介变量的角色。政府信任可以直接影响居民接受型行为意向，而企业信任无法直接影响行为意向，但可以通过作用于风险感知进而产生影响。风险感知在企业信任与接受型行为意向之间扮演中介变量的角色，即随着企业信任的升高，风险感知会下降，接受型行为意向随之上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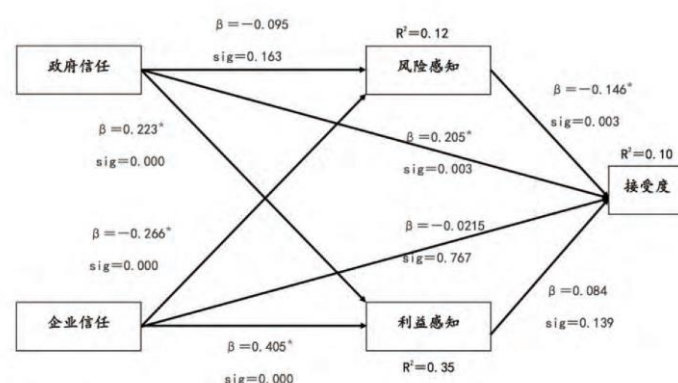


图 1 风险感知、利益感知、政府信任、企业信任与接受型行为意向路径分析结果

五、结论与冲突化解路径思考

(一) 结论

政府信任对利益感知与居民的接受型行为意向有显著正向影响。即居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越高，对邻避设施所带来的利益的感知程度越高，但政府信任对风险感知无影响。

企业信任对风险感知有显著负向影响，即居民对企业的信任程度越高，对其污染风险的感知程度越低，相反，企业信任对利益感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接受型行为意向有不显著的负向影响。

风险感知对接受型行为意向有显著负向影响。即居民风险感知水平越高越可能采取与项目企业或政府主管部门进行协商谈判、通过行政或司法途径要求停止、通过集会或上访进行抵制等行为，以表达停止污染、改善环境的诉求；而利益感知对接受型行为意向无明显影响。

利益感知可通过企业信任的调节效应预测居民接受型行为意向。具体而言,企业信任与利益感知对接受型邻避行为意向均无明显影响,但企业信任可在利益感知对接受型行为意向的作用机理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

其中,企业信任的调节效应在本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其现实意义在于,只要居民对企业的信任感存在,邻避设施周边居民在集体行为选择时都会意向采纳平静接受行为。当邻避设施污染事故发生时,如果居民感知到的邻避设施在经济、教育、基础设施和就业等方面带来的利益越多,加之信任该企业,居民就会意向选择接受该设施及其事故。

(二)冲突化解路径思考

近些年来,对邻避冲突的化解多从合作博弈、完善补偿、风险沟通和协商对话式公民参与策略等方面着手,但这些措施都过于零散、未成体系。基于实地调研的结果,笔者认为,应以“影响接受型邻避行为意向几大因素的作用机理”为核心,在把握民众心理的基础上,高效、有序得防范、化解邻避冲突。风险社会中,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在处理文明的危险可能性问题上存在着断裂与缺口,但同时也保持着相互交织、相互依赖的状况^[33]。这就回归到开篇提出的问题:政治权威与科技权威如何在风险社会中得以维系?本研究结论给出一个清晰的指向——信任。企业信任在感知影响接受型邻避行为意向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调节作用。因此,如何培育居民对邻避设施企业与当地政府的信任度是一个值得发掘的议题。结合实地调查的所见所闻,提出如下三点建议:

政府应当加强安全监管,巩固政府信任。政府部门应当通过做好宣传引导工作来提高民众的政府信任,从而在合理预期内提高民众对邻避设施正确的利益感知;另一方面,政府作为环境治理的主要主体,应当担负起监督、监管、防治工业污染的责任,通过经济手段或行政手段促使污染型企业更新设备、引进先进技术^[34],以促进民众与企业的和谐共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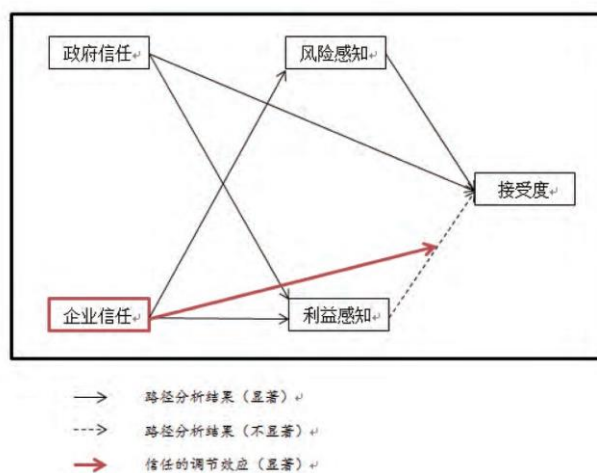


图2 接受型邻避行为意向影响机理模型示意图

企业应当承担社会责任,重塑企业信任。企业作为社会主体之一,在与周围民众相处的过程中应当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企业可通过排污信息即时公开、设立企业开放日等方式与居民进行平等的交流^[35],进一步了解对方的需求,在知识与信息层面上减少认知差异,增强信任;通过帮扶困难居民、就近提供就业岗位安置下岗居民等方式增强企业的社会责任感。

居民应当打开沟通渠道,承认弥合差异。最来源不确定的信息会增强主观上的风险意识^[36],所以民众可以通过加强与企业和政府的交流,以主动向企业和政府申请信息公开,了解企业的排污现状与政府相关政策的方式来化解关于同一事物认知上的

差异,从而准确地感知风险与利益^[7],化解不必要的误会与隔阂。

本文的研究仍存在一定的不足:(1)邻避设施接受型行为意向精准度有一定提升空间。调查对象的感知结果数据是不确定的,因为当被问及感受时,假定要求在1-10分内给出回答,有些人打出的五分可能相当于其他人打出的七分;此外,情绪同样也会影响被调查者的回答。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卡内曼教授给出了相对合理的解决办法,让人们在一段时间内对不同活动所得到的感情进行排序。但由于时间和能力的限制,本文无法使用这种衡量方法。(2)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比如,采访对象对利益感知的相关子变量没有明确的概念,在被问及时无法给出准确的回答,有一些缺省和不知道的回答,所以利用已有数据无法完全考察这一变量的影响,也就可能引起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3)对信任的调节作用的探讨比较粗糙。交互项只能说明信任程度对主观接受型行为意向的偏效应是否取决于另一个解释变量的大小,不能完全解释复杂的相互影响关系。

参考文献:

- [1]胡象明,王锋.一个新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分析框架:风险感知的视角[J].中国行政管理,2014(4).
- [2]Luhmann,N.Trust and Power[M].New York:John Wiley&Sons Ltd.,1979:72.
- [3]黄懿慧,王啸,方慧妍,吴秋荻.政府信任对公共健康风险管理的影响——基于长生生物疫苗事件的创设情境研究[J].公共管理学报,2019(4):83-95+172-173.
- [4]何艳玲,陈晓运.从“不怕”到“我怕”:“一般人群”在邻避冲突中如何形成抗争动机[J].学术研究,2012(5):55-63.
- [5]Kasperson,R.E.The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a conceptual framework[J].Risk Analysis,1988(8):177-187.
- [6]陶鹏,秦梦真.联盟属性差异与邻避设施风险感知——基于透镜模型的实证分析及政策意涵[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117-124.
- [7]朱正威.走出邻避现象的治理困境——评《邻避困境:城市治理的挑战与转型》[J].中国行政管理,2018(4):157-158.
- [8]Slovic,P.Perception of risk[J].Science,1987(236):280-285.
- [9]张乐,童星.“邻避”行动的社会生成机制[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3(1):64-70.
- [10]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何博文,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 [11]唐朝永,陈万明.信任视角下虚拟企业人才聚集冲突治理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3(14):150-154.
- [12]Deutsch,M.Trust and suspicion[J].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1958(2):265-279.
- [13]Luhmann N.Trust and Power[M].New York:John Wiley&Sons Ltd.,1979:72.
- [14]Slovic,P.The Role of Affect and Worldviews as Orienting Dispositions in the Perception and the Acceptance of Nuclear Power[J].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1996(26):1427-1453.

-
- [15]刘冰. 风险、信任与程序公正:邻避态度的影响因素及路径分析[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6(9):99-105.
- [16]辛颖. 邻避困境中公众行为反应影响因素研究[D]. 河北经贸大学, 2019.
- [17]张郁. 公众风险感知、政府信任与环境类邻避设施冲突参与意向[J]. 行政论坛, 2019(4):122-128.
- [18]张乐, 童星. 公众的“核邻避情结”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社会科学研究, 2014(1):105-111.
- [19]王锋, 胡象明, 刘鹏. 焦虑情绪、风险认知与邻避冲突的实证研究——以北京垃圾填埋场为例[J].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6):61-67.
- [20]方芎. 社会信任重塑与环境生态风险治理研究——以核能发展引发的利益相关群众参与为例[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5):67-73
- [21]Luhmann, N. Trust and Power[M]. Chichester: John Wiley & Sons Ltd, 1979.
- [22]Mayer, R. C., Davis, J. H. and Schoorman, F. D. An integrative model of Organizational trust[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5(20):709-734.
- [23]Warhurst, A. Corporate Citizenship and corporate social investment: drivers of tri-sector partnership[J]. Corp Citizen, 2001(1):57-73.
- [24]李小敏, 胡象明. 邻避现象原因新析:风险认知与公众信任的视角[J]. 中国行政管理, 2015(3):131-135.
- [25]王佃利, 徐晴晴. 邻避冲突的属性分析与治理之道——基于邻避研究综述的分析[J]. 中国行政管理, 2012(12):83-88.
- [26]王亭. 垃圾焚烧厂选址公众接受度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D]. 暨南大学, 2012.
- [27]李小敏, 胡象明. 邻避现象原因新析:风险认知与公众信任的视角[J]. 中国行政管理, 2015(3):131-135.
- [28]杨宏山. 转型中的城市治理[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2.
- [29]卡尔·波兰尼. 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 冯钢, 等, 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112.
- [30]杨宏山, 李娉. 城市治理中的双重联盟与冲突解决[J]. 学术研究, 2018(5):36-42+177.
- [31]邹秀清, 钟骁勇. 失地农民冲突意愿形成的心理感知影响因素研究[J]. 资源科学, 2013(12):2418-2425.
- [32]温忠麟, 侯杰泰, 张雷. 调节效应与中介效应的比较和应用[J]. 心理学报, 2005(2):268-274.
- [33]Durant, J. Participatory technology assessment and the democratic model of th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J].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1999(26):313-319.

[34]侯光辉,王元地.“邻避风险链”:邻避危机演化的一个风险解释框架[J],公共行政评论,2015(1):67-73.

[35]毛庆铎,马奔.邻避风险认知偏差与沟通:社会判断理论的视角[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7(5):93-100页.

[36]Pidgeon,N.F.Climate change or nuclear power-No thanks!A quantitative study of public perceptions and risk framing in Britain[J].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1995(18):69-85.

注释:

1 根据谷歌学术搜索结果显示,Denise Rousseau 等人的研究(参见文献[3])截至本文写作时已被引用超过 9800 次,在对信任理解归纳性研究中十分具有代表性。

2 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国家级科研机构。本研究所使用调查问卷借鉴:<http://www.csiro.au/en/Research/MRF/Areas/Community-and-environment/Resources-in-the-community/Chinese-attitudes-towards-mining>

3 使用 PASW statistics 18 对该问卷进行降维分析。